

· 八闽文史 ·

明清之际厦门湾与东西洋间的 人员流动与生活样态

王日根

(厦门大学 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长期以来,海洋活动人群文化层次相对低,其活动甚少见于文字记录。有了官方航海活动以及这批关于海洋的描述之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兴趣就会提升,海洋活动及其生活样态就能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明清之际厦门湾与东西洋间人员流动在自然条件、经济活动、政策支持方面有其必然性。人员流动过程中逐步显现出多彩的生活样态。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海洋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767 (2023) 04-0128-05

收稿日期: 2023-08-28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海洋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长期以来,海洋活动人群文化层次相对低,他们的活动甚少见于文字记录。即使是到郑和下西洋时跟随而去的马欢、费信和巩珍,我们从他们留下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中仍可看出,他们并不是文化层次特高的那一类,这与西方早期航海中只能派较低社会地位的外科医生随同上船一样。但是,有了官方的航海活动,有了这批关于海洋的描述之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兴趣就会提升,海洋活动及其生活样态就能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张燮的《东西洋考》等一批描述海洋活动的著作提供给我们认识中国海洋文化的知识读本。张燮,福建海澄人,目睹家乡人往返于海澄与西洋之间:“澄,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①因为常年往来于东西洋,他们认识到“西产多珍,东产多矿”,其间的风尚“不亲亲而亲释,不问医而问巫”^②。这本来都属于儒家文化浸渍前的状态,这时成为闽南与东西洋之间的差异,也就是人们所习称的“化外”。因为儒家文化的浸化,海澄为主的闽南人勤勉不倦地“梯航以导之,币质以要之,昵之如婴孩,收之如几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广生遂。波斯之藏吐耀,紫贝之玩充牋”^③,极大地填补了闽南物资的短缺。萧基认为张燮这部常年从地方长老那儿获得的知识经过条分缕析记录下来,有力地补充了以往这方面记录的不足,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周起元是张燮的老乡,他回顾历史,认识到汉武帝时已致力于通西域,以舟车之征,佐兵革之

^{①②③} 萧基:《东西洋考序》,署名为“万历丁巳嘉平月廿日西昌萧基书于李署水心堂”,载于《东西洋考》卷一。

需，这是传统时代农业税之外扩大国库收入、满足对外征伐的常用手段。因为地处中原内陆地区，汉代主要以向西开拓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而到了唐宋时期，往海上拓展便成为王朝致意的目标，“自高骈凿南海之石，而夷人来市于粤，子王审知招航海之商，而闽人泛粤以转市于夷。殊俗从此杂处”^①。隆庆元年（1567年）“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②。

一、明清之际厦门湾与东西洋间人员流动的必然性

自然条件。季风性气候注定了厦门湾与东西洋地区是一个彼此关联的自然区域。依靠季风，可以实现帆船的夏秋季出行和冬春季返航。

彼此互补。两边经济的互补性给航行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货源。明代以来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经济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商品种类日渐繁多。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国沿海与南洋地区的海上路线。郑和下西洋偃息之后，福建广东民间力量沿着这条通道开展着与南洋地区的贸易、采矿活动，有的甚至滞留当地，成为商路上的一个个网结。

政策支持。隆庆开海标志着明廷将此前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由漳州月港出洋的商人携带着陶瓷、铁器、丝绸及其他日用品，他们也从南洋地区带回香料、奇珍异兽等，赚取巨额的商业利润。

二、人员流动中形成“我们”的生活圈

新加坡国立大学吴振强教授《耕海：明清东南沿海与传统藩篱的移位》经著名学者王赓武先生推荐，于2017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学界反响强烈。该书使用地理上、文化上边界的概念，细致考察了明清东南沿海百姓自宋元到19世纪早期因为长途贸易而形成的社区与市场，继而考察了晚明至盛清海洋开拓者、边界拓展与海防的关系、贸易、海禁背景下的佛朗机、19世纪50年代福州地方外交中的协定、政治与限度、林昌彝对鸦片战争的反思、18世纪中国对海洋世界的认知，思考“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接着分析了明清东南沿海人民对边界的推展，通过晚明时期闽南乡村“小民”故事中的景观变化、海上贸易活动中绅商农贩故事、晚明经营海洋局势、18世纪到19世纪中国海商的仪式服务和商业财富、因苦力贸易引发的1852年厦门暴动及其中英关系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后一章讨论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闽粤沿海帆船扩张边界的可能性、以陈怡老为例考察1717年至1754年清朝对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的政策、1847年厦门李顺发事件揭示的关于海峡华人地位的法律原则和模糊性。

在生活习俗上，仅举功夫茶为例。功夫茶本来是形成于闽南漳浦地区的，也随移民被带到海外，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吕宋、巴达维亚都盛行泡功夫茶，且形成茶壶（紫砂壶）、茶炉、水壶（陶土烧制）、茶船（青花瓷）、茶杯（若深杯）的组合。这样的组合显然是当时国内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江南宜兴、江西景德镇、闽南漳州、潮州的产品组合成这样的一个阵容，功夫茶习俗也迅速向外扩展，在满刺加、吕宋、巴达维亚、暹罗等地盛行起来。侨民们或也以此凝聚乡情、彰显自我的文化雅性，传播自己的文化到当地国。

这种生活习俗不仅在活人中表现出来，而且在陪葬品中一样清晰呈现。从马来西亚马六甲任富

^{①②} 周起元：《序》，署名为“月溪主人周起元拜撰”，载于《东西洋考》卷一。

收藏的1190套功夫茶具中，我们看到在明末到清道光前的华人墓葬中普遍流行陪葬功夫茶具，其中不乏出自名家之手的高端紫砂壶、高端青花瓷，也不乏仿制、模拟而成的漳潮本地制陶具。高端青花瓷出自江苏宜兴，高端青花瓷则往往出自景德镇，或者是流落到闽南地区的御窑厂的师傅的作品。款识中或标明“孟臣”，或偶有“时大彬”“陈鸣远”“思亭”等字样，有的则刻上一些诗句，也有警句，如“莫贪身外之财”等等。这显示墓主或是因为贸易赚取了高额利润而效仿起当时国内被认为的高端人群的生活状态，给人海上贸易能暴富的印象。

当然，更多的墓主仍属于贫民，他们墓里陪葬的就是仿制的或缩微的劣质的茶具，显示出海上贸易并不必然造富的实况。

中华文明具有延续性创新性的特点，雅俗文化间的相互吸收与共同提高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经历了不断雅化的演进历程，中国的饮食文化存在着区域差异，也彰显出实用和逐渐雅化的过程。譬如士庶的交融、南北文化的交融，在闽南功夫茶的发展史上，也体现出对江南风尚的吸收，同时江南工艺也不断顺应功夫茶的需要实现了茶具的实用化、雅化。像时大彬、陈鸣远、惠孟臣等江南工艺名家的作品赢得一时之选，与他们顺应市场需求和引领消费风尚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重视养生送终，墓葬中的陪葬品表达的是死者生前的生活倾向和观念追求，从墓葬出土的茶具中，我们也能看到功夫茶风尚的普及与传播的广泛性，从中国本土播及海外华人社会，甚至在海外得到了更具延续性的传承。功夫茶风尚的盛行成为中国文化繁荣的伴生物，突出的是和平、和谐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具有跨越阶层、种族、文化界限的意义，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神灵信仰上，闽南地区本来就信仰多元，到了海外华人社会，这种状态依然延续。依靠这些神灵，闽南人提高了搏击风浪的勇气，提升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在狂风恶浪中祈求神灵得以转危为安，则经常转化为他们报答神灵兴建神庙的巨大动力。在马六甲兴建的青云亭便供奉有观世音、妈祖和大道公，这座建于康熙年间的庙宇最初便是安顿亡灵的所在。当时已被任命为甲必丹（笔者按：指供职于荷兰殖民当局的华人官员，他们主要负责在殖民地生活的侨民的诉讼、租、税等事务）的厦门籍侨民李为经出于安定同乡侨民心态发起建立了这座庙宇，从此也给予先后相继的移居者以文化的寄托。

东西洋地区广布的同乡会馆是青云亭的升级版，“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功能大体覆盖了侨居者生活的主要方面，具体还可兼及慈善、教育、诉讼等各个方面。凡福建会馆、永春会馆、潮州会馆、肇庆会馆、三水会馆、琼州会馆、兴安会馆、广东暨汀州会馆、顺德会馆、宁阳会馆、香山会馆等等蓬勃兴起，成为庇护侨居华人的重要组织形态。经商致富的同乡往往是会馆建设的主要出力者，亦为自己赢得良好的信誉，成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

华人会馆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衍化为当地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嵌入到当地国社会管理体系之中，获得了长期延续发展的机会。

三、落叶归根愿望的可能性

较早是因为移出规模小，难以形成联络两边的输送线。后来则因为清政府防范移入的戒备政策阻断了侨民的回归与归厝愿望。在南洋各国的华人墓园里，我们较少看到明代及之前的墓地，或表明明代华人移居规模较小，或表明当时移居者还多能实现回家安葬的愿望。而到了清朝，统治者出

于对异族人的防范，曾试图阻断华人侨居者与国内的往来路线，康熙、乾隆朝都曾发布诏令，规定必须在五年或三年内归国，否则一律作为弃民看待。侨民一旦归国，往往被冠以“细作”或“奸民”而遭遇流放或牢狱之灾。

其实作为与惊涛骇浪搏击的人们，有着“贩儿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视酋长戎王，如揭幕尉”的豪迈，但那是幸运儿的经历，更多的则是巨浪下航船的倾覆和船上人员的溺毙，我们不难在族谱中检索到一个家族大量族人客死于他乡的记载，许多甚至连葬身地的名称都难以确定，落叶归根对于他们而言则完全是奢望。

乾隆年间福建龙溪籍华侨陈怡老的个案就特别令人唏嘘。早在 1619 年，荷兰殖民者在占领爪哇巴达维亚城之后，便招募大批劳工建立自己的城堡，华人劳工被他们相中。但是受到各种谣言的影响，他们对规模较大的华人的戒心越来越严重，酿成 1740 年巴达维亚城西红溪河上的屠杀惨案。这是荷兰殖民者挑动当地人和华人的对立而借刀杀人的行为，城内近万名华侨惨遭屠杀。陈怡老是该城侥幸逃出的 100 多人中的一员，他试图回到福建龙溪老家避避风头，却没有料到清廷制定了严厉的防范海外侨民的政策，福建巡抚潘思榘上奏乾隆，奏报中说陈怡老私自前往南洋，并且在南洋 20 多年中，一直都在为洋人服务，所以他应该是洋人的“细作”。加上他还娶了洋人为妻，生下了混血子女。这不仅大逆不道，且让人怀疑他还有更大的阴谋。乾隆收到奏报之后，在没做任何调查的前提下，就命人立即给陈怡老定罪：“借端恐吓番夷，虚张声势，更或泄露内地情形，别滋事端。”于是陈怡老在靠近厦门港码头前，就被以“交结外国”的罪名发配边关充军，他在南洋辛苦积攒下来的财物也都悉数充公，一家老小 30 多口人被遣返巴达维亚。

明代中后期已经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让沿海贫民有了一条全新的谋生渠道——出海贸易、经商置业，这也引发明末清初国人向东南亚地区侨迁的热潮。清朝建立后却一度走了回头路，严厉实施孤立郑氏集团的禁海迁界政策以及禁绝海外侨民回国政策，康熙五十六年还有专门针对南洋的禁令，禁止皇朝平民出海经商，并勒令吕宋（菲律宾）、噶喇吧（印尼地区）等南洋地区的侨民在三年内返回原籍，否则“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对于绝大部分侨民来说，返乡实际也是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更希望在南洋一番打拼获取财富后再“衣锦还乡”。三年返籍，对他们而言就难以遵从了，毕竟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外打拼多年的心血。因此康熙五十九年禁令到期时，很多侨民仍然滞留南洋并未返籍。

侨民们了解到，地方官员执行中央政策也时有变通，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也觊觎侨民肥满的腰包，希望分得一杯羹。但是这些也是朝廷倍加防范的。雍正帝时期执法堪称严厉，一旦背上“勾连海外番夷，对皇朝不轨”的罪名，那无疑是断了自我的前程，雍正要求沿海官员对这些南洋侨民要严查严办，甚至发出过“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的谕令。他认为：“无赖之徒，原系偷渡番国，潜住多年，充当甲必丹，供番人役使……在外已久，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①乾隆虽然没有变更海禁国策，但他在登基大赦天下时，也施恩于部分南洋侨民。乾隆赦免了康熙五十六年前出洋未归的侨民，如果他们在三年内还籍，可以既往不咎。有侨民借这个机会返回了故乡，但也有人趁朝廷放松的空当，出洋去寻求致富的商机。陈怡老就是在乾隆元年，偷偷前往噶喇吧，到噶喇吧后没过几年就遇到了“红溪惨案”。

在乾隆帝看来，这些人背弃祖宗、君父，是不忠不孝；离开天朝乐土远投化外夷邦，是为点小

^①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

利就自甘堕落、天良丧尽。这种不忠不孝不智不义之徒，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两广总督马尔泰奏报：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乾隆朱批：天朝之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在乾隆的圣训下，这些侨民正式被故国抛弃不再被视为同类、同族，成为了“天朝之弃民，故国之仇雠”。乾隆帝的这一政策基调给了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人更多的激励，这是特别引人深刻反省的。

与此同时，婚姻中的界限与突破也不容忽视。较早搏击海上的人主要是男性，到了异域之后，有的落籍当地，也与当地的女性缔结婚姻、繁衍后代，培养出被称为“峇峇”“娘惹”的新族群。囿于当地国民族政策，这类族群规模大多很难扩大，此时华人社区、华人族群更倾向于在本族群内缔结婚姻。

以上这些往往因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而不同，走上海上丝绸之路的人们幸运者成为殷富，不幸者则沦落、惨死，显然海上丝路也不纯然就是平坦的路，其中有若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总结，以便走好未来的路。

(责任编辑：秦琼 何妍)

**Chinese Imag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Theater Stage:
Text, Performance and Mise-en-scène of *Le Cheval de bronze***

LUO Shilong

Abstract: Scribe's comedy *Bronze Horse* (*Le Cheval de bronze*) premiered in 1835 and was reperformed at the Paris Opera House in 1857. The production of this drama was completed by some important artist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hich jointly developed a romantic love story full of Chinese sentiment and fantasy colors. This *Bronze Horse*, adapted from the story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embodies people's imagination of Far Eastern China at that time. Based on its story source, script plot, as well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contemporary newspaper drama reviews and theater archives, the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image o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theater stage can be examined. At the same time, by focusing on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atrical production and the director's work, how they participated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on the 19th century French theatrical stage can be explained.

Violence and Women: Tragedy Actions in *Bacchae*

TENG Zhixuan

Abstract: The theme of violence in Euripides' tragedy *Bacchae* symboliz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ivine justice of Dionysus and human beings, while the women in the play have shown different reactions to the "polis violence", "sacred violence" and "hunting violence". Women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enduring violence, becoming agents of violence and committing violence. Female "others" from Asia were initially the victims of violence, isolated by the polis order. Through sacrifice, Dionysus turned them into carriers of violence together with the women in Thebes. After leaving the city, Thebes women expressed their desires during the hunt and became violators. The changing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violence leads the tragic actions and reveals the confrontational and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Dionysus, along with the Dionysiac influence.

**Human Mobility and Life Patterns between Xiamen Bay and the East
and West Ocea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Rige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marine activities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ir activities were seldom recorded in writing. With the official navigation activities and these descriptions of the sea, people's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e outside world will increase, and the sea activities and their life style will gradually be clearly presented. The movement of people between Xiamen

Bay and the East and West Ocean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inevitable in terms of natural condition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olicy support. The process of human mobility gradually revealed colourful life styles.

Sino-Ryukyu Relationship Reflected by Chinese Painters' Brushes

XIE Benzhen, XIE Chen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a established a suzerain 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Ryukyu. Chinese court sent a mission to canonize Ryukyu, when each Ryukyu king succeeded. The mission was made up of hundreds of craftsmen, including some famous painters, besides some envoys and attendants. The painters used their brushes to depict the Sino-Ryukyu navigation route, maps and scrolls of Chinese envoys to Ryukyu, queue diagrams of Chinese envoys, and illustrations in the works of Ryukyu canonization. They drew such as the buildings, mountains, rivers, people, clothing, vessels, markets, entertainment, animals, plants, etc. Their paintings help u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ino-Ryukyu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search on the “Ancestor Origin Painting” of the Obaku that Spread Eastward from China to Japan

SHI Qi

Abstract: The Obaku's Ancestor Origin Painting combines many styles of Chinese portrait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a group portrait that gathers into one painting the Dharma lineage since Chan Master Ingen Ryūki eastward journey. It is mostly used in rituals. There are roughly three sources of images for the Ancestor Origin painting. One type is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for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ut-door Portraits. It adopts the elements of literati gatherings and displays interesting utensils, reflecting material culture and personal taste. The second type imitates the Taoism and Buddhism Paintings of Three Sakyamuni Buddhas and Lingshan Dharma Assembly. The third type is influenced by the “generation portraits” of clan ancesto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figure painting style created by Fujian regional painte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early Chinese visual culture introduced to Japan.